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文库——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选集（第一辑）

HUIZHOU WENHUA DILI YANJIU XUANJI DIYI JI

黄成林◎主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学科建设重大项目“安徽师范大学地理学”资助出版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文库——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选集（第一辑）

HUIZHOU WENHUA DILI YANJIU XUANJI DIYI JI

黄成林◎主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丛书策划:黄成林

责任编辑:祝凤霞

装帧设计:任 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选集. 第一辑/黄成林主编.—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文库)

ISBN 978-7-5676-2704-8

I .①徽… II .①黄… III .①文化地理学 – 徽州地区 – 文集 IV .①K9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6021号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选集(第一辑)

黄成林 主编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0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fs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2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2704-8

定 价:36.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辞海》关于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
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的定义的
框架,广义的徽州文化是指一府六县的徽州人在南宋至清末期间社会实践过程
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徽州文化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齐备,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具有独特性、典型性、
丰富性和辉煌性等特征。

徽州文化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愈益受到学界的关
注,专业学术团队不断形成,学术交流频繁,专业性的学术期刊成功创办,研究
成果层出不穷。就研究成果而言,徽州文化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徽商及相关问题
(包括徽商研究、商书研究、会馆和同乡会研究)、宗族与徽州区域相关问题
(包括宗族研究、佃仆制研究、棚民问题研究、土地关系及赋役制度研究、会社研
究)、社会文化史、法制史、艺术史和其他方面^①,涉及的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十二个学
科大类。从二级学科看,相关学科介入徽州文化研究有早有晚,研究成果多少
不一,与研究徽州文化领先学科相比,地理学科研究徽州文化尚显不足。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地域组合及文化区形
成、发展和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并且探讨文化事象在形成和发展中与地理环
境的关系。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徽州文化,无论从传统文化地理学六大研究领
域入手,还是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切入,可供研究的内容非常多,无论哪个方面
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① 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6-55.

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徽州文化都是区域性的地域文化,相比较而言,徽州文化最年轻,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乡村社会的文化,徽州文化核心区空间最小,“小徽州”仅约一万二千平方千米,但其文化特质类型多,显性遗存多,景观密度大,可研究内容多,并且不少文化特质能够为学界所认同,自成一派,如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民居、徽派朴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剧、徽商、徽菜等,这在面积不大的区域性的地域文化中非常罕见。徽州有“东南邹鲁”“文物之海”“文献之邦”之称,且不说数十万件徽州文书和具有省级及以下头衔的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4月,以徽州物质文化为基础的有形遗产中,就有享有世界级头衔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享有国家级头衔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三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二十一处、“国家历史文化名街”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十四处、“中国传统村落”八十六处,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项,等等。虽然徽州文化研究成果灿若星云,但可研究的内容、可探讨的视角还非常多。从地理学科层面看,能为地理人所关注,研究对象必须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抓手”,必须蕴含丰富的地理信息,必须有可以拓宽深究的空间。徽州文化特质满足被地理学科关注的这些前提条件。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具有多重价值。从大的层面看,虽然徽州文化只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具有标本意义的区域性乡村文化,但却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很多内涵需要科学解读和倾心传承。从地理学科层面说,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方文化”,我们可能还不能准确、科学地说出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地理背景和生态机制;都说“景观是观念的外化和固化”,可能谁也不敢说对徽州文化景观“已经完全解码”;都说徽州文化要“古为今用”,可能谁也不敢打包票在利用徽州文化特质发展文化旅游时没有“戏说”的成分;都说“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谁都不敢说已经弄明白了徽商与众多徽州文化特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影响,说清楚了徽州文化整合;都说“徽州文化形成于徽州,影响于域外”,但徽州文化扩散路径、扩散方式未见深度研究;都知道有“大徽州”与“小徽州”之分,到底徽州文化区划的依据是什么同样有待探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我们开展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有很多优势:

一是空间距离较近。学校地处皖南,临近徽州文化核心区。虽然空间距离

近已经不是当今多大的优势,但学院很多老师和研究生研究问题的空间在皖南,熟悉皖南尤其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积累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和文献资料。由于空间距离近,徽州文化核心区是我院地理科学和旅游管理本科专业野外实践定点区域,核心实践内容区域地理、旅游资源都离不开徽州文化源地、徽州文化景观、徽州文化生态、徽州文化整合和徽州文化区等。空间距离近,下乡入村开展田野调查可以“说走就走”。

二是可用资源丰富。首先,当今世界是一个网络社会、开放性社会,众多的学术资源我们可以共享,且不说这方面的学术著作、期刊文献、学位论文以及没有公开的文书,仅出版发行的多卷本徽州文书集萃就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分“宋·元·明编”和“清·民国编”两编,每编20卷,王钰欣、周绍泉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1993年出版)、《徽州全书》(已出版五辑共50卷,刘伯山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至2015年出版)、《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共20卷,黄山学院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千年契约文书集萃》(共10卷,李琳琦主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等,认真研读这些文献,肯定能够从中发现很多可以为我所用的信息。其次,本校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徽州文化起步早、队伍强、成果多,我国本来就有“史地不分家”的传统,向他们当面请教,汲取他们的学术营养,非常方便。还有,学校图书馆馆藏徽州文书非常多,除已经整理出版的外,尚未整理公开的非常丰富的徽州珍贵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分享。再则,前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黄山学院徽文化研究所等省内外徽州文化研究机构或团体学习,到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等以徽州文化特质为主要或重要藏(展)品的文博单位调研,向专家求教,必将使我们受益无穷。

上述资源仅仅是已有文献资源,实地调研以徽州文化特质为核心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等,走访以徽州文化特质为传承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调研与徽州文化有关的生成性资源,等等,更是海量的与时俱进的可以为我所用的资源。

三是已有一定基础。尽管我院老师研究徽州文化地理起步比较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有成果问世,但学者对这些成果给予积极评价,被引用和下载频次非常高。如张祖群先生在《试论徽州文化的文化地理外向扩散与有机保护》一文表3中列出了被引频次位居前三十位的以“徽州”为主题的论文,我们

学院师生的论文占五分之一，“被引频次靠前的文献有两个稳定的来源：一是以安徽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地理学背景学者，同时他们的徽州文献的下载频次也异常高；另外历史学背景、建筑学园林背景、法律、地质学背景的学者合计占另外一半。”^①又如朱竑、司徒尚纪先生在《近年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对我院黄成林老师予以鼓励：“黄成林对徽州文化的生态学研究最为深入，对徽派民居建筑风格、徽菜风味、徽商崛起等文化事象做出了科学的诠释，同时，他又不受环境决定论的束缚，对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文化地理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②陆林、凌善金、焦华富著《徽州村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成果之一，是全面、系统研究徽州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徽州文化全书”之一种，受到广泛好评。

研究徽州文化地理，既有可以研究的空间，还有一定的优势，又逢学院鼓励老师组建徽州文化地理研究团队，资助出版我校专兼职教师和研究生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选集，希望师生积极投身徽州文化地理研究，为徽州文化研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

二〇一六年四月

^① 张祖群.试论徽州文化的文化地理外向扩散与有机保护[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4):45.

^② 朱竑,司徒尚纪.近年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J].地理科学,1999,19(4):340.

前　　言

《徽州文化地理研究选集(第一辑)》，收录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十三篇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论文，以及著作《徽州村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的目录和各章导读。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师生从旅游开发利用的角度研究徽州文化特质的著述非常丰富，其中有的著述亦被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文章高度评价，鉴于这类著述不在本文库主题之列，概未收录。

从入选论文来源看，十二篇是公开发表的论文，一篇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公开发表的论文选自地理学核心期刊《地理科学》《地理研究》《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高校学报。

从入选文献作者看，作者主体是学院的老师，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学院文化地理学研究方向的2012届硕士研究生。

从入选文献研究方法看，主要按照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思路展开，少数文献具有新文化地理学研究气息。

从入选论文内容看，大体包括徽州文化景观、徽州文化生态、徽州文化整合和徽州文化区划等方面。

为了保证入选文献的原真性，编者尽可能遵从原样；为了方便读者追根溯源，按照国标重新标注了参考文献；委托本书责任编辑清绘了不够清晰的插图；对于入选的一篇硕士生毕业论文，限于篇幅等原因，删除了致谢、附录等内容。

入选文献中最早的是发表于二十多年前，特别是编者的几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很是青涩。由于科学技术进步、资料日渐丰富、方法日渐多样、视野日渐开阔，旧作毕竟不是新著，文献的价值可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中黯然失色，这是一种

惯常现象。但是,编者认为,保留原真、记录轨迹、结集出版同样有其意义:一是这些文献代表了作者著述时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可能有些文献历经时间的考验,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二是集中学院师生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方便研究者参考和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三是愿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献身徽州文化地理研究。

入选文献按照徽州文化景观研究、徽州文化生态研究、徽州文化整合研究、徽州文化区划研究和《徽州村落》概览顺序编排。入选论文涉及的内容都比较丰富,讨论的问题不见得就一定属于文化地理研究的某一个主题,编者将其分成几个板块,可能属于望文生义而为之,贻笑大方了。

与很多学科的徽州文化研究成果相比,与全国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成果相比,《徽州文化地理研究选集(第一辑)》仅仅是“三言两语”“一孔之见”。但是,没有“三言两语”哪来“千言万语”,没有“一孔之见”哪来“真知灼见”!这不仅仅是编者所期盼的,更是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资助出版徽州文化地理研究文库所期待的!

衷心感谢已发表文献的责任编辑和刊物或出版社!没有责任编辑的慧眼和润笔,没有这些学术平台,也许就没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

限于编者能力,在文献收录、归类等方面肯定存在疏漏、不当之处,篇章导读也有以偏概全之嫌,敬请读者指谬!

黃成林

于二〇一六年教师节

目 录

徽州文化景观研究

徽州文化景观初步研究	黃成林(003)
徽派建筑的文化含量	陆 林, 焦华富(014)
徽州古村落的景观特征及机理研究	陆 林, 凌善金, 焦华富, 王 莉(024)
徽州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及其分析	幸福森, 黃成林, 尹寿兵(035)
徽州传统村落景观的基本特征和基因识别研究	幸福森(045)

徽州文化生态研究

徽州文化生态初步研究	黃成林(129)
试论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	黃成林(140)
徽州古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研究	陆 林, 葛敬炳(150)
徽州古村落人居环境的选择与营造	陆 林, 徐致云, 葛敬炳(162)

徽州文化整合研究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	陆 林, 凌善金, 焦华富, 杨兴柱(173)
徽州传统村落发展的社会因素初步分析	凌善金, 陆 林, 焦华富(186)
试论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	黃成林(191)

徽州文化区划研究

安徽绩溪县行政区划归属研究 黄成林, 苏勤 (201)

《徽州村落》概览

《徽州村落》目录 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211)

《徽州村落》各章导读 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214)

徽州文化景观研究

徽州文化景观丰富多彩，既包括物质文化景观，也包括制度文化景观和精神文化景观。

“粉墙黛瓦马头墙、高墙小窗窄天井”的徽派民居是徽州最常见的景观，由徽派民居、水口园林、祠堂、牌坊等组成的徽州传统村落是徽州文化的综合性景观，它们与徽州自然环境协调和谐，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向型气质、和谐型风格和伦理型内核。拨开徽派民居和徽州传统村落选址的风水学面纱，审视其山水形胜，其实都蕴含着徽州人追求理想人居环境的朴素的科学精神。

徽州文化景观初步研究

黄成林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文章研究了徽州聚落和民居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因素,探讨了徽州文化景观与徽州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徽州文化景观与徽州自然环境协调和谐,人文环境特别是徽商的经济实力和徽州人传统观念,是影响徽州文化景观表现形式和文化底蕴的主要因素,徽州文化景观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徽州;文化景观;徽州聚落;徽派民居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景观丰富多彩,文化地理学更多地注重研究聚落布局、建筑物式样和土地利用形态等^[1]。徽州文化是南宋至清末在徽州崛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内容丰富,成就辉煌,诸多文化现象自成体系,具有全国性影响,是全面观照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乡村社会的标本^[2],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正在崛起^[3]。本文主要研究徽州聚落和民居景观。

1 徽州聚落景观

民居是聚落的基本单元,聚落是民居的综合表现。在徽派民居基础上形成的徽州聚落,无论其选址、规模,还是形态,既有与周围自然环境适应协调的成分,又受堪舆说等诸多人文因素的影响,既有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山水、生态、宗族、趋吉意象^[4],又有与山区农村聚落一般规律不同的一面。

1.1 聚落选址

出于对宗族兴旺、人文发达、财源茂盛的追求,徽州人对聚落选址慎之又慎。“依山建屋,傍水结村”,是山地丘陵地区聚落选址的一般规律。这种选址模式有地势高爽、视野开阔之利,得自然水系之便,无洪旱灾害之虞,方便生产生活,是山地丘陵这一特定的地形条件下聚落选址的最佳模式。“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民国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除了“依山建屋,傍水结村”外,聚落最佳选址还要求“枕山、环水、面屏”,具体地点则需要堪舆家遍察山水形胜后做出选择。徽州无村不卜。徽州各姓宗谱都详细记载了其始祖卜居择地之事。道光《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详细记载了胡氏选择黟县西递作为安身立命之地的经过和依据:“壬派五世祖因公务去金陵,道经西递铺,见其山多拱秀,水势西流,爰偕堪舆家入西川境,遍观形势,有虎阜前蹲,罗峰拱秀,天马涌泉之胜,犀牛望月之奇,产青石而如金,对靄峰之似笔,风燥水聚,土厚泉甘,遂自婺源迁来此间。”明人吴元满撰《新安歙西溪南吴氏世谱》载,吴氏始迁祖定居西溪南之前,有三个村址可供选择,堪舆家比较后认为,西溪南“土宽而正,地沃而肥,水辑而回,后世大昌也,遂定焉”。今天看来,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堪舆家把“依山建屋,傍水结村”“枕山、环水、面屏”这种理想的人居环境附会上堪舆之说,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弄得很神秘,实质上徽州聚落选址就是选择理想的人居环境,使居住环境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

堪舆说关于“吉地”与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具有因果关系的说法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某种意义上,理想的聚落和宅基环境为居住者提供了一个满意的生活环境,从而使其身心愉悦,始终能怀着一种美好的心境和理想,满怀信心地从事自己的事业,正是这种精神因素或“心理暗示”,激励着人们取得成功。

1.2 聚落规模

“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康熙《休宁县志》卷七《艺文·奏疏》)徽州“地隘斗绝,厥土骍刚而不化。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顺治《歙县志》卷一《舆地·风俗》)。按常

理,徽州山多地少,耕地分散,交通不便,耕作半径小,应该是散居型聚落为主。然而从志书、谱牒和明清聚落遗存来看,徽州以集聚型聚落占绝对优势,而且有的聚落规模很大。徽州“其土瘠,其民劳,不足比于东南沃壤之伦。然深山大谷中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祐有百世之谱”(乾隆《绩溪县志·序》),“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它邑:千家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清代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如黟县雉山以卢氏为聚,婺源三田以李氏为聚,歙县谭渡以黄氏为聚,绩溪上庄以胡氏为聚,休宁西门以查氏为聚,徽州呈坎以罗氏为聚,等等。徽州散居型聚落仅限于大姓的庄户、墓庐、棚民(明清时期从安徽沿江等地来徽租垦山场维持生计者)和被大姓挤出村落的小姓。

徽州聚落以集村占绝对优势,主要与徽州人聚族而居的传统和谋生手段等有关。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徽人多系中原士民后裔^[5],中原士民具有聚族而居以显示宗族繁盛的传统^[6]。中原士民聚族而居的传统风尚,加上受兴盛于徽州的新安理学的熏陶和徽州森严的宗法制度的影响,以致徽州人聚族而居形成集村。另外,初入徽州的中原士民饱受过战乱的蹂躏,从心理定势上看,聚族而居所凝聚起来的宗族力量可以使族人免受外族的侵侮,因此,一些族人在生存环境受到限制时也不愿外迁,仍然要在宗族的庇护下生存,从而使聚落越来越大。

“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序》)“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明代李鼎《李长卿集》卷十九)“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赈·汪伟等奏疏》)徽州人“十分之七”从商,足迹遍及宇内,在外经商获利是徽州人衣食之源,农作所获只是徽州人生活之补充。因此,徽州集村聚居并没有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反而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在聚落中的集聚,扩大了聚落规模。

1.3 聚落形态

徽州聚落形态主要有线状、阶状、团状、象形等几种。线状和阶状聚落是山

区常见的聚落形态,前者主要分布在山麓与平旷地接壤地带,或河流沿岸、大道两侧,后者主要分布在山坡上。徽州的团状和象形聚落很有地方特色。

团状聚落是徽州最常见的聚落形态,是鸠宗聚族而居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聚落是以血缘为基础聚族而居的空间,血缘关系是维系聚落的纽带,体现宗法观念的祠堂是聚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嘉庆《黟县志》卷三《风俗》)在徽州聚落中,不仅每村必有祠堂,有的甚至一村多祠,长卑有序,以血缘关系为背景,分为宗祠、支祠、家祠(如黟县南屏、祁门贵溪),而且聚落建筑以宗祠为物质中心或心理中心布局^[7]:家祠建在支祠周围,同宗同脉不超过五服的直系亲属围绕家祠筑宅;支祠为同宗同脉已超过五服的宗族祠堂,簇拥着宗祠;宗祠为同宗的“总祠”。

象形聚落是形态具有特殊含义或象征意义的聚落。这种聚落的形成发展脱离了“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规划性。或为追念先祖功德,或为祈求荣华富贵,或纯属堪舆之说,徽州人着意使聚落轮廓按照某种图案构筑,以表达自己特定的心理趋向或空间意象,于整体形象中寄托着强烈的心理追求和特定的精神象征。歙县霞坑里方村系钱氏定居地,聚落外围近似圆形,中间有一方形空地,村民住宅建在方形空地周边,外圆内方,整个村落环境似一个硕大的铜钱,而且姓氏(钱)、村名(里方村)和村形(外圆里方)相统一,期盼荣华富贵。明清时期黟县西递是商贾之乡,整个聚落状于舟船,村首七哲祠象征眺台,附近的大树和牌坊象征桅杆和风帆,鳞次栉比的民居象征船舱,希冀行贾一帆风顺。绩溪石家村为北宋开国功勋石守信后裔所建,因当年石守信与赵匡胤交谊甚笃,常以棋交手,故该村设计成纵横有序、整齐方正的棋盘状,以追念先祖功德。歙县高岱村地形轮廓像一杆铳(土枪),本是一块“凶地”,但村人在“铳”的扳机处建一座油坊,喻义“越打越发”,化“凶”为“吉”。黟县塔川村似塔,歙县洪岭村似鱼,徽州区唐模村拟龙等,各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

堪舆说影响聚落形态的典型当属黟县宏村。宏村汪氏始祖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卜筑数椽于雷岗之下”,因数度火灾,发展缓慢。后人认为没有发挥风水宝地的作用,遂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三聘堪舆家遍察山水形胜,认定该地为“牛形”,便筑起了“山为牛首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圳为牛肠塘为胃”的牛形聚落。其实,穿村过户的水圳、村中的月沼、村口的南湖,给村落带来了降温、增湿、方便生活和消防的源源不断的流水,从而大大降低了发生火灾的